

ZHONGGUO YUYANXUE

中國語言學

第八輯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语言学

第八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语言学. 第8辑/郭锡良,鲁国尧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301-26429-4

I. ①中… II. ①郭… ②鲁… III. ①汉语—语言学—丛刊 IV. ①H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5718号

书 名	中国语言学 第八辑
著作责任者	郭锡良 鲁国尧 主编
责任编辑	王铁军 王 飙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429-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374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13印张 324千字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中国语言学》工作委员会

主 编：郭锡良(北京大学)、鲁国尧(南京大学)

学术委员会：(按音序排列)

曹先擢(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陈章太(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侯精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胡壮麟(北京大学)

江蓝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李维琦(湖南师范大学)

陆俭明(北京大学)

钱曾怡(山东大学)

孙良明(山东师范大学)

王 宁(北京师范大学)

邢福义(华中师范大学)

许嘉璐(北京师范大学)

薛凤生(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詹伯慧(暨南大学)

宗福邦(武汉大学)

陈新雄(台湾师范大学)

戴庆厦(中央民族大学)

胡明扬(中国人民大学)

吉常宏(山东大学)

蒋绍愚(北京大学)

李行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宁继福(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裘锡圭(复旦大学)

唐作藩(北京大学)

伍铁平(北京师范大学)

徐思益(新疆大学)

许威汉(上海师范大学)

曾宪通(中山大学)

赵振铎(四川大学)

编辑委员会：(按音序排列)

陈保亚(北京大学)

董志翘(南京师范大学)

黄德宽(安徽大学)

蒋冀骋(湖南师范大学)

李家浩(北京大学)

李小凡(北京大学)

刘晓南(复旦大学)

马重奇(福建师范大学)

乔全生(山西大学)

宋绍年(北京大学)

孙玉文(北京大学)

汪国胜(华中师范大学)

王韶松(山东出版集团)

杨端志(山东大学)

殷国光(中国人民大学)

喻遂生(西南大学)

张 猛(北京语言大学)

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董 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郭芹纳(陕西师范大学)

华学诚(北京语言大学)

李国英(北京师范大学)

李建国(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李宇明(北京语言大学)

卢烈红(武汉大学)

潘文国(华东师范大学)

邵永海(北京大学)

孙建元(广西师范大学)

唐钰明(中山大学)

汪维辉(浙江大学)

吴金华(复旦大学)

杨亦鸣(徐州师范大学)

俞理明(四川大学)

曾晓渝(南开大学)

张涌泉(浙江大学)

编辑部主任：孙玉文

目 录

郭锡良	再谈《鸟鸣涧》的释读问题·····	(1)
	——答蔡义江《新解难自圆其说》	
单周尧	高本汉《先秦文献假借字例·绪论》评《说文》谐声字初探·····	(12)
梁慧婧	谐声不管等之说不可信·····	(32)
周守晋	关于“第三次古音学大辩论”的两点思考·····	(45)
	——从冯蒸教授对这场辩论的总结说起	
方有国	先秦汉语“其”的词性演变·····	(58)
匡鹏飞	连词“无论”形成发展的历时考察·····	(70)
陈国华	《辨字诀》：一部早于《马氏文通》的本土汉语语法·····	(79)
万献初	颜师古《汉书注》音切数据与术语考析·····	(94)
张其昀	论音义结合之相对有理性·····	(104)
	——传统语言起源观补正	
邱克威	辨“刘”“留”·····	(119)
王璐璐	袁毓林 “NP+V起来+AP”句式的语义分析·····	(123)
刘思维	王楹佳 于梦晓 覃夕航 卿 伟 普通话阴声韵中/o/和/e/ 音值的实验研究·····	(133)
郭芹纳	关于《汉语大词典》的一些问题·····	(151)
【笔谈】		
鲁国尧	古诗文吟诵·我学习古诗文吟诵的经历·····	(161)
白兆麟	继承传统学术,创新现代思维·····	(167)
	——《鲁国尧语言学文集·衰年变法丛稿》评析	
张 猛	华学诚 汉语的研究应该尊重科学讲究逻辑·····	(173)
姜望琪	《语法修辞讲话》的前前后后·····	(179)
【转载】		
何乐士	著名的语言学家丁声树·····	(189)
洪成玉	《古今字字典》自序·····	(200)

再谈《鸟鸣涧》的释读问题*

——答蔡义江《新解难自圆其说》

北京大学 郭锡良

提要：王维《鸟鸣涧》的解读早有分歧。十一年前作者发表短文，批评了“春桂”说，赞成“桂花”是指代月光。接着蔡义江发表了批驳文章，作者这次访问王维辋川别墅遗址后，才对蔡文作出了全面反驳。本文首先分析了蔡文对所引用的多首古诗的解释，分别指出它的错误；并根据植物志、县志等论证了从古至今终南山北坡都不可能生长“春桂”。然后结合遗址所处山谷的形势充实了对《鸟鸣涧》的释读，明确了这是一首描写山区春忙季节夜景的田园诗；并对古今用禅理、禅意来解释王维山水的田园诗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关键词：王维 辋川 鸟鸣涧 桂花 月光 山水田园诗

十多年前我看到新编《千家诗》《唐诗选》等选本对《鸟鸣涧》的注释，觉得有些地方不妥当，就写了一篇短文《王维〈鸟鸣涧〉的“桂花”》，发表在《文史知识》2002年第四期。我赞同《鸟鸣涧》中的“桂花”是指月光而不是指桂树的花朵，作了比较全面的考证和分析。《文史知识》同年第七期又推出了蔡义江的《新解难自圆其说——也谈〈鸟鸣涧〉中的“桂花”》，对我的论点进行了批驳。蔡文我多年没有看到，直到2008年吴金华教授邀我到复旦大学讲几次课时，我的讲课题目之一是《漫谈知人论世与字、词、句落实——评古典诗词误释三例》，其中一例就是《鸟鸣涧》。课后，有人把蔡文下载复印给我，后面一次课我对蔡文简单地作了一些交代。我认为它没有解决字、词、句的落实问题，却对他提出唐以前的诗中就有写春桂的例证，表示也许我把话说得太满了，要好好考虑。

2013年暑假陕西师大举办汉语言文字学高级研讨班，要我讲课，我这次又谈到了《鸟鸣涧》的问题。在课堂上，我提到了蔡文，指出他没有弄清楚《鸟鸣涧》是写山区春忙季节的夜景；又分析、推论王维隐居终南山的辋川别墅很可能是处在一个东南山势比西边高的山谷。讲完课后陕西师大的胡安顺、党怀兴两教授带南京大学讲课的鲁国尧教授和我参观了蓝田猿人出土处和王维辋川别墅遗址。参观遗址时，发现遗址的地形完全适合我对《鸟鸣涧》的分析、推论。我高兴得和老友们讨论起来，他们都鼓励我把它写出来。这里就结合蔡文，再谈谈《鸟鸣涧》的释读问题，作一次迟到的答辩。

* 本文初稿曾分送鲁国尧、郭芹纳、胡安顺、张猛、孙玉文等教授，承他们提供宝贵意见，多有采纳，谨此致谢。

这里先抄上王维的《鸟鸣涧》：

“人閒（简体作“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为了让读者了解双方的论点、论据，并把我上次短文的内容简单概括如下，全文可分为两部分：（1）一开篇我就列举了《唐诗选》等注释“人闲桂花落”为寂静中桂花飘落的四种说法，同时也举出《绝句三百首》把桂花释作指代月光的说法，表示我同意是指代月光。并对前说混淆“闲”“静”的词义进行了分析批评，指出几家的解释并不一致，都没有落实字、词、句。（2）论证句中的“桂花”是指代月光。首先指出“花”是“华”的六朝后起字，都有“花朵”“光华”两音两义；隋唐时“光华”一般写作“华”，但仍有写作“桂花”来指代月或月光的，举了梁简文帝、庾信、李贺三人的诗句为证。接着我提出三点来论证《鸟鸣涧》的“桂花”是指代月光的（详情见下文）。

蔡文也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我有关“闲”“静”论述的批驳，第二部分是有关“桂花”的指代问题。这里先谈第一个问题。蔡文开篇就指责我的短文“看起来似乎理由相当充分”，但“结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并用讥讽的口吻说：“历来诗家谈王维《鸟鸣涧》诗的倒不少，唯独不见专说这一句的；旧时注本也未见注释这一句的。这在我想来，是因为这句诗太明白了，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话”，“不像今天有人以为桂花非在秋天开落不可”。接着又奚落《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把“人閒桂花落”注释为“桂花落人间的倒文，意谓月光照亮了大地”；却大捧余冠英主编的《唐诗选》是“集中了当时一批古典文学精英”，“由余冠英负责，钱钟书参加初稿”的精品著作，它把桂花注释为“春日发花的一种”，“是对把桂花注成月光的误解的纠正，是很正确的”。

蔡文奚落《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为什么不也介绍一下选注者的队伍呢？我们知道，这部作品选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高校文科的统编教材，当时统编教材是选择、集中了全国的主要学术力量进行编著的。该作品选是由朱东润主编，“中编由马茂元、胡云翼编选，并与曹融南通读全稿”；隋唐诗是“由马茂元任注释工作”，交代得清清楚楚。这个编选力量恐怕并不弱于《唐诗选》吧？《唐诗选》的《前言》交代：“参加初稿和修订工作的有余冠英（负责人）、陈友琴、乔象钟、王水照同志。”《前言》由余冠英和王水照署名。明白人恐怕最多也只能说各有所长吧？而且蔡文奚落马茂元，也只是他的一孔之见。

至于蔡文说“这句诗太明白了”，我当初也有这种感觉，不过我们完全是从不同角度考虑的。我在上次的短文中说，《唐诗选》“把这句诗注释错了”，跟他的结论正好南辕北辙。在这里为什么“旧时注本”和马茂元等跟我有同样感受呢？这是古人和马茂元、胡云翼这些前辈学者的古诗文语感和生活感受所决定了的，也与他们都有一定的传统小学根底有关。因为这里的“桂花”如果不认准是指月光的话，那么不但这句诗无法落实字、词、句，整首诗也无法说清楚。因此，古人会觉得“这句诗太明白了”，用不着注释；马茂元有学生古今语隔的顾虑，采取了“倒文”这个不恰当的说法。

我上次的短文首先从字、词、句落实的角度批评了几种注释本，提出：“‘閒’和‘静’的意思是不同的。‘閒’是闲暇、空闲、悠闲，重在表示没有事情、没有活动，与‘忙’相对；‘静’是安静、清静、寂静，重在表示没有声响、安定不动，与‘动’相对。‘閒’一般是没有安静义的。”批评一些注本，“用‘寂静’或‘安静’来释‘閒’，已经犯了转

移概念、注释不准确的毛病”。蔡文讥讽我：“这有点像讲现代汉语，又像是不知一个字本就有多种义项。”又以古注用“对举”“互文”来“证明语辞的同义”来反驳我。

很抱歉，我在这里不是讲现代汉语，而是根据传统训诂学和现代学科汉语史来讨论问题的。蔡文在后面说：“建国初我还在念大学时”，“恩师夏承焘教授曾为我改过一首习作小诗”。看来他大学毕业大概在1955年以前吧？那么他分不清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训诂学、汉语史内容，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因为那时中国根本没有开设这些课程。他专搞文学，毕业后也没补这方面的知识，才会指鹿为马吧！

再说，传统训诂学中用“对举”“互文”来证明语词同义，这必须十分严谨，因为诗词中对举的词语未必就同义。他却从《诗词曲语辞汇释》中引了一条：“坐，犹自也。《文选》鲍明远《芜城赋》：‘孤蓬自振，惊沙坐飞。’善注：‘无故而飞曰坐。’无故而飞，犹云自然飞也。坐亦自也。坐与自为互文。”蔡文津津乐道地拿它来作为自己强辩的有力论据。我们知道，张相汇释词语，没有从语义系统出发；正如他在《叙言》中所说的：“竭其千虑，终有一隔。”特别是以“互文”作为论据，更易失准。蔡文却以此为据，论证“王维将‘閒’与‘静’对举作互文”，说明“閒”“静”意思相同。他全没有考虑这里的“閒”“静”的语义关系与“坐”“自”是否一致或相似，这已经是方向错误。

进而他还列举了三联诗句，按照他的理解来强辩。（1）“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闲。”（王维《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诗）蔡释：“这里的‘静’与‘闲’也都是大雪中静寂无人的意思。”（2）“人闲始遥夜，地迥更清砧。”（李商隐《摇落》诗）蔡释：“也说人寂静时长夜才刚开始。”（3）“向来幻境安在？回首总成闲。”（刘克庄《水调歌头》词）蔡释：“‘闲’更只有空的意思了，与有没有‘活动’‘事情’毫不相干。”

蔡文强辩的手法之一是：代替对方设置不能成立的说法，说什么“我们总不能把‘闲庭’解说为没有事情的庭院、‘闲花’为没有活动的花吧？”从我的短文能得出这样的解释吗？按我的思路（从词义系统考虑）只能认为：“闲庭”的“闲”是与“空闲、清闲、悠闲、休闲”有关，“闲花”的“闲”是与“闲置、闲散、空闲”有关。“闲”的词义引申网络是复杂、多向的，有近义词，还有同源词；但是“闲”还是“闲”，不是“静”。如果古人在这里要表示“寂静”义，为什么不说“静庭”“静花”呢？

蔡文强辩的手法之二是：跟《唐诗选》等注释《鸟鸣涧》的“闲”相似，不管词义系统，不落实字、词、句。我在上次短文中只从词义系统方面批评了几种《鸟鸣涧》的注释，没有作具体语句分析。这里不妨补作一点汉语语法分析：《中华古诗文读本》：“人闲桂花落：在寂无人声之时，桂花轻轻飘落。”《唐诗选》：“‘闲’，寂静意。在寂无人声人迹处，花开花落无声无息。”刘璞《“桂花”不是月光》：“夜已深，人们都安睡了……夜静极了，甚至连桂花飘落的声音也隐约可闻。”我们知道，“人闲桂花落”是两个主谓结构，上述三种解释不一致，有哪一种把“人闲”表述准确了呢？至于两个主谓结构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笔糊涂账。上次我批评他们“已经犯了转移概念、注释不准确的毛病”，错在哪里？

这里蔡文所举的例（1），“闲”与“静”对举，都是“静寂无人的意思”。试问，能不能换成“深巷闲”“广庭静”呢？勉强换了，是不是意义也将有变化？例（2）是“人闲”与“地迥”对举，为什么“闲”又不是“迥”义呢？这一条条都说明每个字词都有自己的语义系统，不是可以随意搅混的。例（3）的“闲（閒）”，蔡文以惊讶的口气说“更只有空的意思了”。这有什么奇怪呢？“閒”从造字开始就是表示“空隙、间隙”的，“閒空、

空閒”是引申义(同源词)，“閒”本身就有“空”义。蔡文的惊讶只是表现出他对词义系统太不熟悉，少见多怪了。不过，也应该指出：“闲”直接表“空虚”义的确实不多，这里与押韵有关。

二

现在谈第二个问题。我上次的短文叙述了“花”“华”的音、义关系及简单的历史变化后，又指出从六朝到唐代都有用“桂花”指称月亮或月光的，举了梁简文帝《望月诗》、庾信《舟中望月》、李贺《有所思》的三联诗句为证。接着提出三点来证明《鸟鸣涧》中的“桂花”也是指称月光的。(1)一般都知道桂花是秋天开花的，江南许多地方女孩九月出生(农历)，往往取名“桂华”或“桂花”。(2)分析《全唐诗》出现“桂花”“桂华”的全部诗句，作出统计：“在76首写到桂花的诗中，近三分之一的诗作可以推定是写秋景的，其他是无法确定季节的。”因而推论说：“大致反映了一般人的认识，桂花是秋天才开花的。”(3)引述了李时珍《本草纲目》、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陈昊子《花镜》三本古代著作有关桂花的论述(这里只摘引最重要的词句)：“桂生合浦交趾”，“江南桂八、九月盛开”，“又有四季桂、月桂，闽中最多……花时凡三放”。得出结论：桂树本是南方树木，逐渐向北移植；四季桂、月桂“只生长在南方亚热带地区，像福建、广东”等地；“岭南以北，长江、黄河流域，都只生长八、九月盛开的秋桂”。

蔡文首先从讽刺我“借助于电脑检索”统计《全唐诗》，“有超过三分之二写到桂花的诗”“无法确定季节”，“何其多也”开始；接着就挖苦我摘引李颀的诗，理解错了。李颀《送东阳王太守》：“昔年经此地，微月有佳期。洞口桂花白，岩前春草滋。”他认为是写春桂的。大度地表示：“我(蔡)宁可相信是他(郭)没有看出来，而非隐瞒不报。”

我的短文是把它“列在不能肯定是指称月还是植物的三首诗之中”。蔡文是如何肯定它是写春桂的呢？他说：“‘微月’(初三之月)怎能把地面照‘白’？又为何单单照在‘洞口’呢？”(郭按，为省篇幅，只引最关键的字句，下同。)请问，“微月”真是“初三的月牙儿”吗？还是去好好研究一下吧。要知道，张继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才真是写初三的月牙儿。这里的“微月”起码也是初五、初六以后的月亮。还有，桂花的特点在香味浓烈而不在颜色，它的花小，隐藏在叶丛中；照不白地面，又怎么照得见桂树开出的花是白色的？而且桂花一定是白色吗？至于为何单单照在洞口，这也很好解释。就因为昔年相聚之处是在“洞口、岩前”。这里可以肯定，看走了眼的是蔡文；上次短文我没有肯定它是指称月还是植物，这次则毫不犹豫认定是指称月光。

接着蔡文提出，唐以前诗中就有写春桂的，举了两例：(1)“桂吐两三枝，兰开四五叶。是时君不归，春风徒笑妾。”(鲍令暉《寄行人》)(2)“缓步遵汀渚，扬桡泛春澜。电至烟流绮，水绿桂涵丹。”(摘自江淹《采石上菖蒲诗》)请问，鲍照妹妹的诗真的写了桂花吗？

“桂吐两三枝”只是说桂树春天吐出两三枝嫩芽来，怎么就成了开花啊？江淹说的“水绿桂涵丹”，倒确实是说的桂树开花，而且是开红花。不过，可惜蔡文又没弄清楚江淹是在哪儿写的这句诗。经考察，这是江淹贬官吴兴县令时所作；吴兴即现在福建省浦城县，培植丹桂的历史悠久，现在被称为中国的丹桂之乡。江淹“梦笔生花”的故事就出在这里。我在短文中交代很清楚：“四季桂、月桂，闽中最多”；批驳者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下面，蔡文绕了很大一个圈子(三四百字)，引用“段成式‘据所见’否认有秋桂，

已遭讥议”，告诫我“不能走向另一极端”。然后才举出两人三例“唐诗写春桂”的例子。

(1)“吾爱山中树，繁英满目鲜。临风飘碎锦，映日乱非烟。影入春潭底，香凝月榭前。岂知幽独客，赖此当朱弦。”(李德裕《春暮思平泉杂咏》二十首中的《山桂》)(2)“相思春树绿，千里亦依依。鄂杜月频满，潇湘人未归。桂花风半落，烟草蝶双飞。一别无消息，水南车迹稀。”(于武陵《友人南游不回因而有寄》)(3)“日暖上山路，鸟啼知己春。忽逢幽隐树，如见独醒人。石冷开常晚，风多落亦频。樵夫应不识，岁久伐为薪。”(于武陵《山中桂》)

例(1)李德裕的《山桂》真是写的春桂开花吗？大可商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首先要弄清楚李德裕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出这《杂咏》二十首的。原来他是在党争中被排挤出放当地方官，在淮南节度使(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市)任内写的。《杂咏》二十首有三首是写桂树的。这是第九首，第六首是《红桂树》，第八首是《月桂》，每首题后都有花色的介绍。《月桂》后还有产地，如：“出蒋山(今南京钟山)，淡黄色。”平泉是李德裕在洛阳南的一处很大的山庄，范围有十里。《杂咏》二十首大都表现了他退隐田园的思想，在第三首《书楼晴望》中说：“幽居人世外，久厌市朝喧。”是最直接的说法。三首写桂树的诗，则是退隐思想的形象表现，并非描写当时“暮春”的平泉景物；何况“影入春潭底”，也只是“山桂”之影，并不是“桂花”。

例(3)于武陵的《山中桂》，题目就值得商讨，《全唐诗》作《山上树》，下注“一作桂”。全诗还有五处异文，没有一处提到“桂”，只说了“幽隐树”(且《全唐诗》本作“处”，下注“一作树”)，连樵夫都不认识。这要落实为“春桂”，恐怕太勉强吧？只有例(2)这首于武陵的诗，从字面看，是说的春桂开花，其实是当时党争中的艺术形象。《全唐诗》载：“于武陵，会昌时(841—846)人，诗一卷。通考大中(847—858)进士。”我匆匆浏览了他的50首诗，多退隐、忿慨之辞。这时正是牛李党争激烈阶段，大中二年(848)九月李德裕被贬为崖州(今海南)司户，第二年死在崖州。我认为，于诗是透露着党争的某些消息。我们即使再退一步，承认蔡文的分析，那么陕西有春桂的诗作最多也不过一首，比我统计的《全唐诗》中可以肯定是写秋桂的有近三分之一(二十多首)，是否少得太多了？可是作者却以此为据，推论“当时终南山一带，不但有春桂，而且可能还很多”，“还相当出名”。把诗句、诗题中有南山和桂花字词的诗，都论述成写终南山的春桂，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独有南山桂花发”。这恐怕也太随意了吧？即使一时博得读者的赞同，恐怕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吧！

接着，蔡文提出古人只把“从上往下、由高向低掉的现象，称作‘落’”，“光与落的概念连不起来”。还指责我“举‘桂花’指代月的第一个例子”“就搞错了”。他重新“举那首诗的前半”(我只举一联)说：“流辉入画堂，初照上梅梁。形同七子镜，影类九秋霜。桂花哪不落？团扇与谁妆？”(梁简文帝《望月诗》)他分析：“说月光的只是开头‘流辉’二句，三四句说月形同镜，光影似霜。五六句说，即传说月中有桂花，它怎能老不零落呢？”“这里的‘桂花’，并非指代月，它还是桂花，只不过是传说里的月中桂花而已”。我的短文举萧纲的诗句明确是“以桂花指代月”，而未说指代月光。六句诗句句都是写望月，发问也是向月发问，而不是向桂花。蔡文几百字的论述里，一下是月，一下是月光，一下还跳到月亮中间去了，逻辑混乱。这恐怕很难服人。

至于古人“光与落的概念连不起来”的说法，却不得不回应几句。“月光落”三字我

们虽没有在古籍中找到,但是落霞、落晖、落照、落月的词语却是古人常用的,这是古人把这两个概念连起来的方式。杜甫《梦李白二首》中“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一联中的“落月”,难道不是落进房屋中的月光吗?王勃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滕王阁序》)中的“落霞”,既可以落向地面,还可以“与孤鹜齐飞”啊。而且《鸟鸣涧》中是以“桂花”来指代月光,更谈不上“概念连不起来”。蔡文最后还用“已故恩师”为他改过的“一首习作小诗”来教训我如何写诗,如何理解王维的《鸟鸣涧》。这受到了推出他大作的编者按语的高度赞扬!可是我早就确认他(蔡)对整首诗都理解错误,尤其经过这次的再学习,更加坚定不移,对他的那些颇欠考虑的说教,只能敬谢不敏了。

我还想回问一点,在上次的短文中我花了接近四分之一的篇幅引证三部本草、花卉著作说明桂的种类、生长地域,以此说明长江、黄河流域只生长秋桂。这是我三个证据中的首要证据,蔡文却只用“所引用的前人书上的话,是完全得不出这个结论来的”,就一笔带过。请问合适吗?

为了证实这个问题,这次我更要在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论据上占用较多篇幅。我一方面查阅了《中国桂花栽培与鉴赏》《陕西植被》等著作,发现今人的研究成果与明、清古人差不多,有发展而更细致。众所周知:桂花喜温暖、湿润,它的生长对温度、湿度、日照都有一定要求。《中国桂花栽培与鉴赏》说:“桂花喜温暖,适合生长在亚热带地区……实践证明,露地栽培桂花,以年平均温度在 15°C 以上,1月份平均温度在 3°C — 5.5°C 之间,极端低温不小于 -8°C 最宜。”(18页)它跟古著一样,“将桂花品种分为四季桂、银桂、金桂、丹桂四个品种群”。(26页)介绍银桂、金桂、丹桂三个品种群都是“植株较高大,多为中小乔木。花期集中于8—11月间”。(27页)只有“四季桂品种群,植株较低矮,常为丛生灌木状”。有两种类型,一种“多见于冬季和春季花期”,一种“主要见于秋季花期。花期长,以春季和秋季为盛开期”。(26页)它还概括介绍:“桂花原产于我国西南部和喜马拉雅山东段”,“在我国云南、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和广西等地,均有野生桂花树分布。”现在“秦岭以南至南岭以北的广大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地区,是桂花集中分布和栽培地区”。(3页)又指出“桂花花期一般为9—10月份。桂花植株的开花迟早,因品种不同而异”。也“因地区气候环境不同”而“有迟有早”。(15页)还说:“我国长江以北地区的桂花多为盆栽。”(99页)“作为盆栽桂花品种,多为灌木型。”“四季桂品种群中的所有品种,以及银桂、金桂、丹桂品种群中的部分品种,均适合盆栽”,但“以四季桂品种群中的品种作盆栽,较为多见”。(39页)“颐和园盆栽桂花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当颐和园‘颐和秋韵’桂花展拉开帷幕时”,就可以看到这些古桂。(179页)

《陕西植被》指出:秦岭北坡位于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带的南部,因此,亚热带生长的“许多植物是本省(陕西)秦岭北坡及其以北所没有的(就是秦岭南坡也仅有少量,而多见于巴山),如黄杉……川桂、香樟”等。(407页)又,“还有一批属于亚热带的植物,如经济植物,如油桐、油菜”,“果树主要有柑橘”,“四旁绿化植物有苦楝、桂花”等,“这些植物绝大多数不越过秦岭而生长”。(408页)

我还查阅了《中国植物志》。此书80卷126分册,体现了中国植物学的最高成就。第31卷载有樟科月桂属28个品种的桂花简介,全是乔木秋桂,最矮的3—6米,最高的达28米。产地多为华南、西南,其次是浙江、江苏、江西和湖南、湖北,都被列为多个品种的产地。陕西则只列为高达25米的川桂一个品种的产地之一,十多年前秋天我在陕西师

范大学开学术会议，正好碰上校园内一株高大的川桂盛开。

第 61 卷载有木犀科桂花 5 个品种的简介。这里最需要介绍的一种是：“木犀，通称桂花。常绿乔木或灌木，高 3—5 米，最高达 18 米”，“花期 9—10 月”。“原产我国西南部，现各地广泛栽培”。编著者还特加说明：“笔者在查阅广东、浙江、江苏、四川、福建等地大量标本中以及观察庭园栽培植物中，仅发现少数标本花序近帚状，俗称四季桂（小灌木，高 1.5—2.0 米，一年可开几次花）。”（108 页）木犀科桂树有灌木，有春桂，但是包括庭园栽培也只在长江流域以南。其他木犀科桂树四个品种，都只生长在华南的广东、广西、海南或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

从《中国桂花的栽培与鉴赏》《陕西植被》到《中国植物志》都说明秦岭以北地区没有春桂，与明清的本草著作论述一致。这样说来，我上次的引证是正确的。蔡文的作法，不说是隐瞒证据，也要算掩盖事实了。蔡文还批评我顺便提到的“向朋友请教，也都说陕西的桂树是秋天开花”的，说道：“这充其量只能说明今天的情况，可是沧海桑田”，要考虑自然环境变迁；按他的说法，陕西唐代有春桂，现在没有了，是由于“保护生态环境和物种多样性”做得不好，“乱伐森林”造成的。这就不得不指出，蔡文太想当然了。古今植物著作都明确论述了，桂树本是岭南植物，随着生产技能的提高，日益向北移植，这是我国林业生产发展的大方向。我们要尊重科学，要尊重古今植物学专家的研究成果；“沧海桑田”是不错，但是不要分不清方向，混淆事实。据今《蓝田县志》载：“（蓝田）年平均温度 13.1℃。一月份平均温度 -1.3℃。”（65 页）与上文提到的桂花栽培适宜温度相比，很明显气温过低，不适宜桂花露地过冬。栽种秋桂都有困难，至于春桂就只有盆栽了。可是唐代恐怕还没有温室盆栽技术吧？更何况蔡文描述的春桂是带有自然生长的色彩啊！看来，蔡文“唐代陕西有春桂”的说法，真不知道它怎样逃脱“难自圆其说”的结论。

三

蔡文批驳我的主要内容，以上已经作了初步答辩。从这次答辩过程，我才发现我面对的不仅是一个蔡文的作者，他还掳获了一些粉丝。比如，《文史知识》发表他的文章时，就有署名“望舒”的编者按，给蔡文唱起了热情洋溢的赞歌：“《鸟鸣涧》的‘桂花’飘落千年，到底是花，还是月光？小小一个争论居然关联着词语训诂、地理考察等方面，但不少人只顾及这局部问题（郭按，颠倒是非！），而忽视了整首诗的意境。于是蔡义江先生旁征博引，更从诗歌本身的写法方面着眼，得出‘月光说不能成立’的结论，可谓完满（！）。”也有人“以为蔡说完全正确”，断言郭某“自以为是”，面对蔡文的批评“没有任何话可说”。这两个材料都是友人提供，我才看到的。经过认真思索，我认识到，这些粉丝固然是判断能力出了问题，大概是没有山区农村生活经验吧；但是我原以为只要解决了“人闲桂花落”一句之后，全诗的释读也就解决了，没有把问题点透，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吧。

下面就从这次访问王维辋川山庄遗址说起，再谈谈我对《鸟鸣涧》的理解。据清嘉庆年间所修《蓝田县志》载：“辋川口即峽山之口，去县南八里。两山对峙，川水从此北流入霸（灞）。其路则随山麓凿石为之，约五里，甚险狭，即所谓扁路也。过此则豁然开爽，此第一区也。团转而南，凡三十里，至鹿苑寺，则王维别墅。”又引《雍大记》：“商岭水流至辋谷，如车辋环，凑落叠嶂，入深潭，有千圣洞、茶园、栗岭，唐右丞王维庄在焉，所谓辋川也。”（卷一）

又据新修《蓝田县志》载：遗址坐落在蓝田“县东南十三公里处”（62页）的终南山的飞云山一个山谷内，现属辋川乡；终南山在县境东南部，形成群山如带的山地，绝大部分海拔在一千到一千五百米之间。山谷坐东北朝西南，宽近百米，长两百米以上（据笔者目测，下同）。山高估计在五百米以上，东边的山梁比西边高出较多，沿东山梁的山脚有一条小溪。山口就是辋峪河（辋川）。它发源于南面的葛牌乡、红门寺乡。在辋川乡境内，还有一条从东往西的支流，发源于东边的蓝桥乡，全长五公里左右，即旧志所引《雍大记》叙述的“商岭水流”。

我一看到《鸟鸣涧》这首诗，就想到只有像别墅这样坐东北朝西南（或者坐东南朝西北）的山谷，才会让仲春二月忙了一天的农民休闲收工，看到某些突兀山头的月光（不是月亮），感受到月光从高空散射的余照；回家后，清洗，照料好家禽家畜，人喧马嘶，一点不寂静，等吃完晚饭，睡了觉，才会出现夜静山空的境界；再过相当长时间，才会有一轮望月（十五、十六的月亮，不是月光）从东边山头冒出来，照亮了整个山谷的一切角落，因而惊动了山鸟，以为天亮了；于是飞到水涧中去嬉戏、鸣叫。《鸟鸣涧》所写的田园生活只可能出现在特定地理环境（东边山梁高耸的山谷）和时间条件（满月）中，王维捕捉到这一串难得的画面，写下了这首传诵不衰的田园诗，也给没有山区生活经验的人留下一些不易理解的“难题”。

辋川现名辋峪河，流到县城蓝关镇汇入灞河，往西北流至西安市灞桥区汇入渭河，全长一百多公里（据今《县志》）。今《蓝田县志》在飞云山下载载：“山南有唐代诗画家王维别墅遗址，原有鹿苑寺、母塔坟，1963年向阳公司在此建厂而毁。现存唯有王维手植银杏树一棵，王维钓鱼台遗址一处。”（62页）明代何景明游《鹿苑寺》诗说：“旧宅施为寺，青山属野僧。高人不可见，胜迹已无凭。”

六十年代建的厂子还在，向他们打听王维遗址情况时，只推说就在银杏树那块。我们在三四人合抱的银杏树下照了相，看到山口挂了“王维山庄”牌子的饭馆。当时感慨颇深，心想：“千年银杏在，不见旧楼台。”我们连游鹿苑寺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这个厂子应该搬走，文物应该恢复。不过，对我个人来说，访问不但落实了“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的地理环境，也让我对王维有关终南山、辋川的诗作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我们知道，山庄是先天元年（712）后宋之问留下的产业，王维估计是在开元二十九年（741）得到了它。住宅就在现存山谷遗址内，庄田应该在山谷外的辋川峡谷之间。从王维诗作看，当时庄园风景优美，物产丰富，很有点像江南依山傍水的山区水乡（王维诗句：“轻舸迎上客”，“清浅白石滩”，“莲动下渔舟”，“漠漠水田飞白鹭”）。在当时交通应算方便，可以乘船、骑马直达当时的京城长安，不愧“终南捷径”的称号。《辋川集》就是王维与裴迪闲游山庄各景点所作绝句的结集。《鸟鸣涧》居首的《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也像是写的辋川山庄的景色。

经考察，晚唐诗人储嗣宗《过王右丞书堂二首》其二：“风雅传今日，云山想昔时。”可知王维山庄当时的小地名应是“云山”，今《蓝田县志》还列在“飞云山”下。皇甫岳是世家子弟，皇甫铸（元和年间（806—821）相宪宗）的堂兄（参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他“漂沦”仕途（王昌龄《至南陵答皇甫岳》：“与君同病复漂沦”），迷恋道教的“烧丹、避谷”。（王维《皇甫岳写真赞》：“烧丹药就，避谷将成。云溪之下，法本无生。”）我们估计他比王维要年少二三十岁。两人交往当是皇甫岳去辋川拜谒长者，“云溪”很可能

就是别墅东边山脚下那条小溪。晚唐耿伟《题清源寺即王右丞故宅》：“儒墨兼宗道，云泉隐旧庐。”“云泉”似乎也可作为一个旁证。这里不妨作一推想，也许是天宝九年（750）后王维丁母忧期间，皇甫岳去辋川别墅拜谒王维，像裴迪一样就住在庄上（下详），既陪伴王维，又干他的“烧丹、避谷”。《云溪杂题五首》和《皇甫岳写真赞》都是王维送给晚辈的书法作品。

王维隐居终南山，置备辋川别业后，他上要服侍老母，下要主持家庭生产和生活，实实在在成了庄园主。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到，他雇工不但种了水田、漆树、花椒（参看《积雨辋川庄作》《漆园》《椒园》），还养了獠（猿属）和麝（香獐）（《戏题辋川别业》：“藤花欲暗藏獠子，柏叶初齐养麝香”）。种了田，就要过问给雇工送饭，他在《积雨辋川庄作》中说：“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菑。”还要过问耕种进程和年终缴税，他在《酬诸公见过》中说：“屏居蓝田，薄地躬耕。岁晏输税，以奉粢盛。晨往东皋，草露未晞。”王维对农事、农时也是相当关心的，他在《新晴野望》中说：“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在《赠裴十迪》中说：“田家来致词：‘欣欣春还皋……请君理还策，敢告将农时。’”他在辋川所创作的许多山水田园诗，主要就是写终南的山水风景和田园生活的。这些诗不少表现了山河的壮丽、淡雅，田园的清澈、闲适，当然也带来了作者出世、退隐的思想，包括佛教的清静无为、色空思想。他确实写过一些类似偈颂、阐述禅理的诗篇，但是不能把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同它混为一谈。

蔡文最后还是搬出了胡应麟的《诗薮》，认为《鸟鸣涧》“颇能表现出诗人的一种出世的禅学追求”。这里必须指出，古今一些论者以寓有“禅意”“禅理”来解释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我是难以苟同的。先说胡应麟，他在《诗薮》中说：“太白五言绝，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如：‘人闲桂花落……’‘木末芙蓉花……’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此妙诠。”胡应麟的说法只能说是他的主观之见。在我看来，《鸟鸣涧》这首诗，恐怕他并没有读懂。其原因有二：（一）胡应麟没有弄清古今字“花”“华”的发展史。宋代以后，两字分用；胡氏看到“桂花”，想不到它还可以表示月光。（二）胡应麟没有山区生活经验。他是明代兰溪人，《明史》称：“万历四年举于乡，久不第，筑室山中，搆书四万馀卷。”不过兰溪地处今浙江中部金衢盆地，海拔只有五十至二百五十米左右，即使“筑室山中”也得不到身处终南山的生活感受。

至于今人，有的直接把《鸟鸣涧》的诗句同佛经挂钩，有的说“它似乎与人世毫不相干，花开花落，鸟鸣春涧，然而就在这对自然的片刻直观中，你却感到了那不朽者的存在。运动着的时空景象都似乎只是为了呈现那不朽者——凝冻着的永恒（按，指常住不灭的本体佛性）”。（李泽厚《禅意盎然》，《求索》1986年第4期）我已经指出“花开花落”是理解错误，至于“鸟鸣春涧”也只是诗人的田园生活感受。哪来什么“本体佛性”？对今人来说，造成失误的原因除古人所有的两点外，看来还要加一条，就是缺乏传统农村生活的体验，对“人闲桂花落”这种仲春农忙情景有隔膜的。总之，用禅意来解读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是不妥的，很难不掉进主观臆断的泥坑。而且这也是对诗人王维的误解，王维是诗人、画家、书法家，也是庄园主；他自己都说：“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题辋川图》）从他的作品、处世来看，都是儒家思想为主，不是信禅坚定的和尚。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特别强调落实字、词、句，文选注释无疑要贯彻始终。三结合以文选为纲，通论讲语法、音韵、词汇，讲古代文化常识，把常

用词列入教材，都是考虑了这一原则和需要的。王先生还指出不少文学注释本，这方面太随意。我完全同意先生的意见，读古典作品，首先就要落实字、词、句，进一步就要知人论世。不落实字、词、句是某些古诗文注释、评论的通病。有的人喜欢说“文学作品不宜太坐实了”，也有人说“诗歌是文学创作而不是自然考察报告”，进而大谈意境创造。其实文学创作的艺术形象、意境，都是用语言文字表达的；如果不能落实到字、词、句，在我看来，那就只是掩盖学风轻浮、主观武断的遮羞布。

我过去对学生讲，搞古典的人，脑子里要有个历史年表和古今地图。通过这次访问辋川，我又有一点体会，就是搞古典文学似乎也有做点田野调查的必要。从陕西回来后，准备写这篇答辩，再读王维的作品，就有不少新认识。首先，我觉得王维隐居终南和隐居辋川是前后两次的流行说法，恐怕就需要研究。历来人们对终南山的范围，认识就不太一致，首先有人把终南山与秦岭混为一谈，就是不妥当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地图册》“陕西省图”，将太白山、首阳山、南五台、终南山从西往东列为秦岭的下属山群，可能是比较合适的。80年代以来，“陕西省图”将南五台归并到终南山，大概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吧。我认为，在王维的心目中辋川在终南山群山之中是没有问题的。

我浏览王维的诗文和参考一些研究王维的论著后，得出一个看法，他经营辋川山庄应该是开元二十九年。《唐诗纪事》说：“（裴）迪初与王维、兴宗俱居终南。”他们三人，是不是都在终南山有庄园呢？根据我的考察，王维有，就是辋川别业；他表弟崔兴宗也有山庄，但不在辋川，而是在灞河东边支流之一的同峪河峡谷之间的玉山（今属玉山镇）。杜甫《崔氏东山草堂》：“爱汝玉山草堂静，高秋爽气相鲜新……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这是杜甫访问崔兴宗的诗，提到访王维（王给事）不遇。从现在《蓝田县志》的地图来看，东庄（玉山）在西庄（辋川）东北，两地之间，估计有五六十里。至于好友裴迪，我认为他没有庄园。理由呢？就在两人唱和的《辋川集》中。王维《华子冈》：“飞鸟去不穷，连山复秋色。上下华子冈，惆怅情何极？”裴迪诗：“落日松风起，还家草露晞。云光侵履迹，山翠拂人衣。”裴迪到了华子冈，他就“还家”了。原来他当时还是秀才，没有官职，好友新得庄园，贺喜参谋，当然就住在好友的庄子上了。这就造成了两人一段共同游山玩水、来往唱和的机会，也因此有了流传后世的合著《辋川集》。王维后来在《山中与裴秀才迪书》中还忘不了告诉好友，他“夜登华子冈”的情怀。除了这段时间，两人长时间一起游乐的机会看来并不多。

至于《终南别业》《终南山》等诗应该是在《辋川集》以后的作品。请看《终南山》：“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太乙是蓝田县境内终南山的最高峰，高2604米，在王维山庄南面辋峪河主源处，两地相距四五十里左右。这次寻找遗址，先到了峰顶，汽车盘山不费事，不到一小时就看完了南北两面的千崖万壑。王维徒步登山，一天回不到自己的山庄，只得找个歇宿处，落下个“隔水问樵夫”。我认为只有在辋川有了一段生活经验，才会干下这样的事情来。还有《投道一师兰若宿》诗说：“一公栖太白，高顶出云烟。”可见王维没有把太白山归属终南山，而且这首诗应该是写在《终南山》之后；因为太白山在眉县，高3666米，若是到过太白后，再上终南，按理就不会说“太乙近天都”这样的话。

* * *

这次访问王维辋川遗址，只能算一瞥，连走马观花都够不上；不过收获确实还不小，同时也让我了解了上次短文发表后的一些反应，促动我写出了这篇答辩。

参考文献：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植物志》卷31，科学出版社，1982年。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植物志》卷61，科学出版社，1992年。

雷明德等编著《陕西植被》，科学出版社，1999年。

黄莹、邓荣艳编著《中国桂花栽培与鉴赏》，金盾出版社，2008年。

（清）王开沃纂《蓝田县志》，嘉庆元年（1796年）。

蓝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蓝田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蔡义江《新解难自圆其说》，《文史知识》2002年第7期。

郭锡良《王维〈鸟鸣涧〉的桂花》，《文史知识》2002年第4期。

2013年10月1日初稿于燕园

11月10日定稿于燕园

高本汉《先秦文献假借字例·绪论》评《说文》 谐声字初探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 单周尧

提要：高本汉《先秦文献假借字例·绪论》认为《说文》中有误认的谐声字，并举出 16 个例字。本文对这 16 个例字作了全面的讨论，梳理了历代各家的观点，分析字形字义渊源，并从古音的角度判别谐声字与谐声偏旁的读音远近。从而得出结论：高本汉认为许慎误认的谐声字，大部分并非误认，至少我们不能断然排除其作为谐声字的可能性。

关键词：谐声字 《先秦文献假借字例·绪论》《说文》

1. 绪言

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1889—1978）《先秦文献假借字例·绪论》说：

每当我们着手考订一个谐声字而把这个字音当作某一项假借在声韵上能够成立的主要证据时，我们就会面临两个难题。其一是，确定哪些字真正是谐声字；其二是，那些谐声字的上古音是什么样的。对于前一个问题，中国的古语学者（训诂学者）总会不约而同地把许慎抬出来，视许氏的《说文解字》为金科玉律。如果《说文》说：某字从某声，那就再也不容许有任何讨论的余地了。然而我们应该知道，许慎是公元第一世纪时代的人，对于他以前千余年所使用的古语，必定所知有限，并且虽然他是一位伟大的天才，而他的《说文解字》又是被人奉为圭臬的，但是他仍然犯下了许多严重的错误。由于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绝对地有必要来建立一项观念，那就是：不可迷信许慎对于字词所作的解释。在下文我们将举出的一些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许氏所说的某字从某声，实际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我们之所以敢于对《说文》下如此的判断，就是因为周代早期语音的系统与要点已经被我们建立了起来（请参阅拙著《中国声韵学大纲》“*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在这篇论文里，有关拟测古音系统的理由，都作了逐条逐点的说明，每一个结论，都有它相当厚实的依据。自然在细节方面还应该再作增补，不过我相信整个的系统对于本书的研究颇有帮助。……并且拙著《增订汉文典》“*Grammata Serica Recensa*”，也已经把先秦文献的用字与读音都作了系统地胪列。许氏误认的谐声字有：